

人口學刊
第 31 期，2005 年 12 月，頁 69-103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No. 31 December 2005, pp. 69-103

戰後台灣農村勞動遷徙現象： 以小龍村為例

李俊豪*

* 立德管理學院地區發展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93/5/17，接受刊登：94/6/12

中文摘要

戰後台灣的經濟結構，從農業生產快速地轉變成以工業生產為主。其中，鄉村工業的興起是國家經濟發展過程重要的一環，一連串的經濟結構變遷不免影響農業地區人力資源的運用。勞動遷徙是人力資源運用方式之一，而家庭是農業社會中基本的生產與消費單元，本研究討論在不同的經濟結構下，家庭內部因素（特別是，家庭成員對農地與地區內工作機會之可及性）如何影響早期台灣農村社會的「勞動遷徙」現象。

結果顯示，經濟結構的改變對「勞動遷徙」現象影響甚鉅，家庭內部因素與家庭勞動移民人數的關聯性主要受制於經濟結構。隨著經濟結構的改變而興起的鄉村工業發展，造成農業生產與非農業生產的工作機會同時存在於鄉村地區，進而促使農村居民改變其人力資源運用方式。特別是，因非農業工作機會提高，農村居民實踐「勞動遷徙」的必要性因而降低，造成「離農不離村」的現象。

關鍵字：勞動遷徙、鄉村工業化、經濟結構

Labor Migration in a Rural Village in Post-War Taiwan

Chun-Hao LI*

Abstract

The postwar Taiwan rapidly shifted from an agriculture-based economy to an industry-based one. Thi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defined its position in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ompanie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amine how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influenced the strategies of utilizing human resource in rural areas. Labor migration was the major part of the strategies for utilizing human resource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labor migration.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by B. Gallin and R. S. Gallin in the mid-1960s and the late-1970s from an agrarian village in central Taiwan. The research adopts the family perspective,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strategy of utilizing human resources is a part of family sustenance strategies. To face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rural villagers develop new strategies of utilizing human resources to ensure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needs of labor input and family consumption.

The results show the stro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hange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ocal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Leader University

of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labor migration. Although in the late-1970s, larger families had more labor migrants than other types of families, facing the increases of rural industrial jobs, villagers developed new strategies for utilizing human resources. While some villagers still decided to migrate to c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increased the villagers' possibilities of obtaining non-farming jobs and farming family land simultaneously. Meanwhile, land-holdings generally were not related to labor migration. This means that during the mid-1960s and the late-1970s, land-holdings did not influence how families developed their strategies for utilizing family human resources.

Key Words: Labor migrati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c structure

壹、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台灣，在經濟方面的發展舉世聞名，經濟結構從原先以農業生產為主快速地轉變成以工業生產為主（Ho 1978；Lu 1981）。戰後的台灣經濟發展約略可分為以下三個時期：進口導向時期（1952-1960）、出口導向時期（1961-1973），與技術密集時期（1974 以後）（Lu 1981）。

自 1950 年代早期起，台灣政府實施一系列經濟發展計畫。政府首先於 1952 年實施第一個四年經濟計畫，並於 1956 年實施第二個四年經濟計畫（Lu 1981）。此時期的國家經濟發展策略是「以農養工」，農業生產是國家經濟的基礎，工業的發展仰賴農業生產。在國際貿易方面，台灣對外的出口則以廉價的農產品或加工後的農產製品為主（Lin 1985），同時政府也開放工業產品的進口，並企圖透過工業製品的輸入以學習與發展新工業生產技術。

1960 年代，台灣的經濟發展正處於出口導向時期，政府分別在二大都會區附近設立加工出口區—楠梓與潭子，並發展勞力密集工業。由於勞力密集工業的發展，由農業生產所釋放出的過剩勞工得以在新興的勞力密集的工業生產中找到生存的機會。以女性勞工為例，當時約有 83% 的女性勞工從事四類勞力密集工業：食品加工業、化學工業、成衣和紡織工業，與電子儀器與零件製造業（見 Ho 1978: 211）。儘管如此，農產品仍是此時期的外銷主力。誠如 Ho（1978: 210）所言，「在 1964 年，.....農產品和加工之農產品佔台灣輸出總值的百分之六十。」

事實上，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在 1973 年，正值世界石油危機之際，石油價格快速上揚，以輸出勞力密集工業產品為主（例如，紡織品或成衣和塑膠製品.....等等）的台灣面臨經濟蕭條，國際貿易的進出口量明顯萎縮（見 Lu 1981: 6-7）。另一方面，為了突破外國市場的保護

主義，政府在 1976 年改變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新的經濟發展政策宣示以發展高技術產品取代勞力密集的工業製品（見 Lu 1981: 7）。一連串的大型基礎建設在 1970 年代轟轟烈烈地展開，提供工業轉型所需的基礎設施（例如，核能發電廠、煉鋼廠、造船廠、國際港、國際機場、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等十項建設）。除此，台灣政府更利用戒嚴法維持內部的政治穩定，並實施諸如長期低利貸款、減稅之類的措施以吸引外國資金（蔡宏進，1978、1981；Lu 1981）。

跨國企業的持續性投資使得台灣從原來僅依附在日本之下的貿易關係加速發展到與歐美國家的緊密經貿關係，台灣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與角色得以更加明顯。而戰後的台灣在短短的三十年間，快速地從一個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邊陲國家躍升為半邊陲國家；從為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核心國家提供廉價的農產品、農業加工產品與勞工轉型為以生產與輸出高技術產品為主的半邊陲經濟實體。

戰後台灣政府積極發展工業，但卻忽略農業發展，農業生產自戰後逐年降低其在國家經濟中的地位。這種不均衡的發展造成從事農業生產與非農業生產的勞動者間收入的差距。如 Ho（1978: 140）所言：

在 1950 年代早期，非農業生產之每人平均收入是從事農業生產者的二倍。1950 年代中期之後，快速的工業化加劇農業生產與非農業生產的利潤差距。如此的發展，到了 1966 與 1970 年間，平均每位從事非農業生產的國民的收入已是農業生產國民的所得的三倍。

伴隨著農業與非農業生產所得的差距、新工業區的興起、人口成長的壓力、與農業生產勞力的過剩，人力資源的運用策略在農業地區面臨必須改變的壓力。在 1950 和 1960 年代，農村人口快速成長使得農村家庭對農地的需求增加，同時對於工作機會與生存/消費的需求也同步增加。此時期的農村人力資源運用策略包括，過剩的勞力必須季節性地移往都市從事短

期工作 (Ho 1978)。

戰後初期，鄉村地區僅有少數人口從事非農業生產，鄉村工業化對台灣農村人力資源的運用的影響甚鉅。新式工業原僅分布在大都市或其周圍 (蔡宏進，1981；Ho 1979)，由於爲了取得廉價的勞工與土地，自 1960 年代中期起，工廠開始在鄉下地區出現。根據 1971 年的工商綜合普查資料顯示，約有 50% 的工業之就業機會分布在少數幾個較大都市 (見 Ho 1979: 83)。一九七九年的官方資料顯示，約有 43% 的工廠設立在島內 12 個農業縣 (見蔡宏進，1981: 21)。

鄉村工業的興起使得農業家庭的生存機會大增，以及減低農村居民對土地的依賴 (Ho 1979)。鄉村工業化與逐漸建立或改善的道路系統提高農村居民參與非農業生產 (特別是工業生產) 的機會，在不必要改變住所的情況下，他們可以在工作地點與農村的住所間通勤。此外，部分的農業人口則可以在從事非農業生產之餘耕種自家的農地，從事農業生產 (Ho 1978)。因此，Ho (1979)、Lin (1985) 與 Park and Johnston (1995) 指出，鄉村工業化使得農村家庭收入來源得以分散，不必全然仰賴農業生產，也促使農業家庭的收入提高與經濟狀況改善，家庭間的經濟差距也漸趨近平等。

由於鄉村工業區在 1960 年代中期到 1970 年代末期間在農業鄉鎮中快速地建立，致使農村經濟結構的變遷 (Ho 1979)，也導致台灣農村地區居民的生活面臨重大的改變；舊式的人力資源運用方式已到了不可不變的地步。本文試圖以過去的實證資料探討農業地區居民的人力資源運用方式的改變 (尤其是勞動遷徙現象的改變) 與經濟結構變遷的關係。換言之，研究者試圖探討農村地區在不同經濟時空背景下所呈現的勞動遷徙現象的差異，以及勞動遷徙現象在農村經濟變遷過程中的轉變。在本文中，筆者首先簡述本研究的理論背景，以及引用葛伯納 (Bernard Gallin) 與葛瑞黛 (Rita S. Gallin) 發表於 1966 年和 1982 年的基本家庭、人口、與經濟資料以介紹研究區域，使讀者對本研究地區有進一步的認識。在第四部分

中，筆者介紹各個研究變項的操作型定義，並說明變項間的關係，進而從三個面向分析與討論不同經濟結構下農業地區內的家庭「勞動遷徙」現象的改變。

貳、理論背景

過去文獻多分別從「個人取向」或「結構取向」的角度來討論人力資源的運用。然而，這二者是可以互補的；因為一個人雖然是考量其個人的特質而擬定對自己有利的「人力資源」運用策略，但是任何一個策略的決定過程都是必須考量其特定的時空背景。是故，對於人力資源運用的討論應是個人取向與結構取向並重。過去的台灣本土相關人力資源運用研究（特別是針對勞動遷徙的討論之研究）亦以個人或結構取向為主。¹然而，上述二個取向的論述卻是忽略了家庭在農村地區的重要性。一方面，在農業社會裡，特別是過去的台灣農村，家庭是生產性與消費性的基本單元。另一方面，家庭取向的論述可扮演串連的角色；在個人取向與結構取向的論述間擔任橋樑的功能，將二者有效地整合（Chant 1992；Schmink 1984；Wood 1981）。因此，本研究以家庭取向的論述作為探討農村人力資源運用現象的基礎，亦期彌補過去本土勞動遷徙研究的不足。

由於家庭是基本的生產與消費單元，Grigg（1980）、Guest（1989）與Wood（1981）等學者認為，農村居民為因應經濟困境而衍生的一連串家庭行為模式可被視為家庭的生計策略（sustenance strategies），這些策略主要則在滿足家庭成員的「勞力的投入（labor input）」與「消費（consumption）」

¹ 過去針對台灣島內的人口遷徙研究以二大取向為主流：個人的與結構的取向。個人取向的研究著重在探討各個地區的遷徙者的個人特質（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等）的差異（見尹建中，1978；李棟明，1974；廖正宏，1977；張明正，1979；姜蘭虹，1978；蔡宏進，1978；Liu 1993；Speare 1974）。結構取向則以地區（縣市或鄉鎮）為基本單位的整合性（aggregated）人口移動資料探討區域產業不均衡發展與人口移動的關連性（見蔡宏進，1981；Liu and Tsai 1990；Tsai 1990）。

的二項需求。家庭人力無論其個人特質（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專長、經驗.....等等）為何，都應該全數被運用；換言之，具有勞動力的家庭成員都應有工作的機會。這些勞動力被運用後則必須生產足夠的產品或收入以滿足家庭成員的生存/消費需求（Boyd 1989；Grigg 1980；Guest 1989；Wood 1981）。當經濟環境發生變化時，一個家庭必須發展出新的人力資源運用策略以解決家庭經濟困境，並且滿足家庭成員的「勞力投入（或是工作機會）」與「消費」需求。具體而言，農業家庭必須決定新的人力資源運用策略以使得家庭成員有足夠的工作機會，並且這些策略運用所帶來的結果必須能滿足家庭成員的生存/消費需求。當家庭成員的工作機會與生存/消費需求都能得到滿足時，農村家庭是不需要改變現有的人力資源運用策略，但是當經濟結構的改變造成家庭成員的工作機會的需求或消費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時，農村家庭則必須改變其現有的人力資源運用策略。

促使家庭成員的「工作機會需求」或「生存/消費需求」得以滿足的新人力資源運用策略可能包括將部分家庭勞動人口配置在地區內的勞力市場，或送往他地尋找新的工作就業機會。家庭取向的學者認為，人力資源運用策略是一種家庭生計或生存策略，「勞動遷徙」是整個農村家庭人力資源運用策略的重要部分。然而，「勞動遷徙」策略是否會被運用主要涉及四個層面的因素：農地與地區內工作機會的可及性（Grigg 1980；Guest 1989；Wood 1981）、風險分散（Massey *et al.* 1993；Stark 1983、1991；Stark and Bloom 1985；Wood 1981）、相對剝奪感與社會階層（Stark 1984；Stark and Bloom 1985；Stark and Taylor 1989）、與社會網絡（Dinerman 1978；MacDonald and MacDonald 1974；Massey *et al.* 1987；Massey and Espana 1987；Massey 1988、1990a、1990b；Massey *et al.* 1993；Mines and de Janvry 1982；Mines 1984；Mullan 1986；Taylor 1986；Tilly and Brown 1967）。當農業地區居民賴以維生的資源有限時，如何滿足居民的基本「生理需求」可能較如何滿足其「心理需求」更重要。農地是農業地區居民滿足基本「生理需求」的主要生產工具，並且農地決定大多數居民的工作機會，農地比其他三項心理層面的可能因素對於勞動遷徙現象有更重要的影響力。因

此，本文進一步地將討論的重心定位為，以家庭取向為基礎探討勞動遷徙與農地和地區內工作機會之可及性的關聯。

參、研究地區與資料

本研究以一個台灣中部地區的農村為例，為保護研究對象的隱私權，筆者在本文中將以「小龍村」稱呼這個村落。²在 1950 年代，農地是小龍村的主要生產工具與家庭經濟來源，稻米和蔬菜是農地上的主要作物。1958 年的戶政資料記載小龍村裡有 609 位村民，其中大約有五分之四的人口是 45 歲以下，男性人口佔整村總人口的比例略少於百分之五十（Gallin 1966）。此外，村中共有 99 個家庭，大家庭、小家庭、與折衷家庭所佔的比例分別是 5%、66%、和 29%（Gallin 1966）。

本文所分析之資料係由葛伯納與葛瑞黛分別蒐集於 1965 年與 1979 年。原始資料內容包括：半結構性的訪談資料與官方的戶籍資料。筆者首先將原始的個人資料（如，性別、生日、教育程度、工作或就業狀態、遷徙狀態……等等）整理，並輸入電腦建立一個包含所有小龍村村民的個人基本資料檔案，並進一步將個人資料整合成一個家庭資料檔案。家庭資料檔中則包括家庭的型態、總人數、勞動移民人數與農地資料（如，農地面積、農地的所有權、農地的耕作方式）……等等。本研究採用家庭資料檔案，其中包含 1965 年的資料（八十二個家庭）與 1979 年之資料（七十三個家庭）。

在 1950 年代末期與 1960 年代初期，人口成長所造成的農地不足現象

² 早在 1966 年，葛伯納博士就根據他的實證研究出版「小龍村」一書。在書中，葛伯納以「小龍村」一詞來稱呼其研究地區。由於，本研究地區與葛伯納博士所調查的「小龍村」範圍一致，遂在本文中，筆者沿用同一名稱稱呼本研究地區。這村落中居民的祖先在十八世紀時自中國福建沿海的泉州與漳州地區遷徙來台，早期居民以閩南語為主要的溝通語言。

逐漸浮現，並且開啓了小龍村的勞動移民風潮。根據政府資料，小龍村的總人口數從 537 人小幅成長到 545 人，但實際居住在村莊中的人口數由 454 人減少到 389 人。在 1965 年和 1979 年間，居住在外地的小龍村村民幾乎成長一倍；居住外地的人口數從 83 人增加至 156 人，分別佔小龍村當年總人口數的 15% 和 29%。³同時期中，在研究地區或附近從事非農業生產的勞動人口快速地增加，以農業生產為主要職業的人口則急遽地萎縮。

事實上，小龍村的經濟發展與台灣島內的發展趨勢一致，從以農業生產為主轉變到以工業生產和商業為主的生活型態。研究資料顯示，在 1965 年小龍村內的自耕農人數佔所有勞動人口的 53% (134 人)，在 1979 年自耕農人數降低至 60 人，佔總勞動人口的 26%，從事非農業生產的人口比率從 26% (83 人/317 人) 急遽地增加到 54% (164 人/305 人)。

肆、資料分析

小龍村內勞動人口結構的改變，事實上是台灣經濟結構變遷下的產物，也反映農業在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急速地下降。1965 年農業生產佔 23.6% 的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1979 年農業生產所佔的比重降至 8.6%。在研究地區內，自耕農人口也有老化的趨勢，男性自耕農的平均年齡從 1965 年的 38.1 歲，提高到 1979 年的 54.7 歲，女性自耕農的平均年齡則從 28.8 歲提高到 45.0 歲。此外，全區農業人口所耕作的農地面積從 43.0 甲減少到 39.2 甲。這些資料皆顯示小龍村經濟結構的轉型，而經濟結構的轉型對研究地區內人力資源運用方式勢必產生影響。由於勞動遷徙是農業家庭人力資源運用的重要方式之一，是故筆者以「家庭」為主要的分析單位，從三個面向（家庭型態、農地可及性、與地區勞動市場可及性）討論農業地區內的家庭「勞動遷徙」現象與經濟結構

³ 滯外人口的增加是因：(1) 早期外移人口在遷徙地定居、成家、並繁衍子嗣，與 (2) 一九七〇年代的遷徙活動以「房 (conjugal unit)」為主要單位，已非過去的個人式人口移動，故總滯外人口數急遽地增加 (見 Li 1999 ; Li 2001)。

變化之間的關係。⁴

一、家庭型態與勞動遷徙之關係

家庭類型的差異除顯示人口組成份子不同外，也反映出家庭人口數的多寡。基本上，台灣的主要家庭型態有三：小家庭（conjugal families）、折衷或主幹家庭（stem families），與大家庭（joint or extended families）。一般而言，大家庭的人口數較其他類型家庭為多，小家庭的人口數則較其他類型之家庭為少，折衷家庭則介於二者之間。另一方面，一個家庭就像一個人，經歷出生、成長、衰退與死亡的階段，各個階段的家庭有不同的人口數。當一個家庭從小家庭逐漸轉變成一個大家庭，它的家庭人口數也會隨著增加。家庭人口數的成長增加家庭消費需求，家庭勞動人口數也可能因而增加並擴大其成員對工作就業機會的需求。因此，在一個農業地區，家庭型態的差異除了顯示家庭人口數的不同，也可能反映各個家庭對農地不同的消費與勞力輸入（工作或就業機會）需求。

對一個大家庭而言，當農業工作就業機會不足時，部分家庭成員移居到都市尋找工作就業機會是非常必要的。農業地區的大家庭雖然因人口數較其他類型的家庭為多而需要利用人口移動的方式來解決農地不足的困境，但是大家庭也可能是最有潛力以勞動遷徙方式解決農地不足的困境。當勞動人口過剩，而農業生產又無法完全放棄，部份大家庭的勞動人口必須遷徙他處尋找工作就業機會，但大家庭也最有能力應付與處理因部分家庭成員外移所遺留下來的農耕工作的情況。換言之，大家庭最不易因人口外移而產生農業生產勞力不足的現象。相對地，因為人口數最少，小家庭對於工作就業機會的需求較其他類型家庭小。一個完整的小家庭通常由一對父母親與其未婚子女組成，由於家庭份子簡單與人數少，消費與勞力輸

⁴ 由於本研究之樣本數少，所以研究者放棄採用複雜的多變量統計分析，而仰賴二變量分析，並引用葛伯納與葛瑞黛早期作品中所提供的基本人口特性資料作為本文作者的見解與論述的佐證。

入（工作機會）的需求因而較小，勞動人口遷徙的迫切性也較低。小家庭較不易實踐勞動遷徙的原因還包括，由於勞動人口較少，勞動人口外移後所遺留的農業生產工作無人可承擔。總之，小家庭實踐「勞動遷徙」的可能性較其他類型家庭為低。所以，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假設是：

H1：大家庭或折衷家庭比小家庭有較多的勞動遷徙之家庭成員。

（一）測量方法

本文所指的「勞動移民者」是，自小龍村移至他地的具有勞動力之居民。在家庭層面，本研究計算移往他地的勞動家庭成員人數以作為一個家庭的勞動遷徙的指標。因家庭型態有三種，研究者採用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檢驗第一個研究假設 (H1)。首先，研究者檢驗是否不同的家庭型態有不同的勞動移民平均數，進而，以「post hoc 多重比較」檢驗大類型的家庭（如，大家庭或折衷家庭）的勞動移民平均數是否有高於小家庭的勞動移民平均數。

（二）分析

1965 年的資料顯示勞動遷徙與家庭型態關係不顯著：家庭勞動遷徙人口數並不會因家庭型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表 1 所示，1965 年與 1979 年的資料雖然均顯示大家庭或折衷家庭有較多家庭成員成為都市勞動力的一部分，如 1965 年的折衷與大家庭平均有 0.87 個家庭勞動人口往都市遷徙，而小家庭則只有 0.64 個。然而，F 檢定則顯示，在家庭成員參與都市勞動力的個數上，小家庭與折衷或大家庭間之差異並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p=0.31$)，1965 年的資料因此並未支持第一個研究假設。

另一方面，表 1 的資料顯示，1979 年的資料則支持第一個研究假設，F 檢定顯示不同家庭型態間之勞動移民人口數有顯著的差異 ($p=0.00$)。本研究進一步利用「post hoc 多重比較」針對 1979 年資料檢驗是否較大的家庭型態比較小的家庭型態有較多的勞動移民人口數。如表 2 所示，雖然

小家庭與折衷家庭間在勞動移民人口數的差異並未達到 $\alpha=0.05$ 的統計顯著水準，但是，大家庭的勞動移民數則顯著地多於小家庭與折衷家庭。在家庭勞動移民數上，大家庭分別較小家庭與折衷家庭多出 3.89 和 3.64 個。簡而言之，表 1 與表 2 之統計檢定顯示，在 1979 年，小龍村裡的大家庭比其他類型的家庭輸出較多的勞動移民。

表 1 勞動移民數與家庭類型之變異數分析：1965 和 1979

	平均數†	樣本數	F
1965			
小家庭	0.64 (0.87)	44	1.06
大家庭與折衷家庭‡	0.87 (1.17)	38	
1979			
小家庭	0.42 (0.87)	36	50.60***
折衷家庭	0.67 (1.05)	24	
大家庭	4.31 (2.14)	13	

*** $p < 0.01$; ** $p < 0.05$; * $p < 0.10$

† 括號中之數字為標準差。

‡ 由於大家庭的個數僅為二，因此，在本分析中大家庭與折衷家庭合併為一類以利分析。

表 2 不同家庭型態間之勞動移民人口數差異之比較：1979

家庭型態	平均數之差異與其顯著性
小家庭 vs. 折衷家庭	-0.25
小家庭 vs. 大家庭	-3.89***
折衷家庭 vs. 大家庭	-3.64***

*** $p < 0.01$; ** $p < 0.05$; * $p < 0.10$

綜合針對 1965 年與 1979 年的資料分析，研究者發現，在早期的農村社會，較大類型的家庭（如，折衷家庭與大家庭）不必然因其家庭成員較多而有較多的勞動移民人口數，因為勞動遷徙並不是一種熱門的人力運用方式。早期農村裡，農業家庭把勞動遷徙視為一種維持家庭生計的策略。面對都市的不確定性，農村裡的人們無法確定遷徙到都市所可能產生的效

益，因此小龍村內常由男性村民獨自遷徙到都市裡去找尋工作就業機會，把妻兒留在鄉下（Gallin and Gallin 1974；Li 2001）。除此之外，許多遷徙村民仍保留他們在鄉下的農地以防萬一，葛伯納與葛瑞黛（1974: 344）甚至指出，大約有四分之三遷往台北的勞動移民仍然持有農地。無論家庭型態為何，小龍村村民可能把繼續持有農地當成一種因應未來的潛在經濟壓力的策略；一旦在都市（遷徙地）裡的工作不順利，村人可以返回小龍村重操舊業，再度從事農耕工作。

在 1960 年代中期，折衷家庭與大家庭雖然有較多的家庭成員數，但並未有較多的勞動移民成員到都市裡尋找工作就業機會。這個現象另外反映出二個事實：(1) 農業生產需要大量勞力；(2) 都市缺乏適合的就業機會。當時大部分的農民每年都種植二期稻米。種植稻米需要相當多的勞力，在缺乏現代農業技術與機器的情況下，小龍村內的稻米耕種（包括，播種、插秧、灌溉、施肥、鋤草、收割……等等）完全仰賴人力（見 Gallin 1966: 49）。在 1960 年代，因為稻米耕種使用了大量農村人力，是以輸出部分勞動人口到都市尋找工作就業機會以增加家庭收入的策略並不普遍，除非家庭經濟情況已經非常惡劣（Gallin and Gallin 1974）。此外，因為適合的就業機會少，在 1960 年代未婚男女很少遷徙到都市去尋找工作。綜合上述之二因素，在 1960 年代，小龍村的家庭通常只有一或二個具有勞動力的已婚男性家庭成員到都市尋找工作就業的機會。因此，如 1965 年的資料所示，小龍村的家庭勞動移民數並未因家庭型態的差異而有顯著之差異。

在後期（1979 年），居住在都市並參與都市勞動市場的小龍村村民超過 1965 年的數字與比例，從 65 人提高到 87 人或從 20.5% 提高到 28.5%。另一方面，型態較大的家庭（尤其是大家庭）比較小型態的家庭有較多的遷徙家庭成員。這些轉變主要可以歸因於二大因素：經濟與家庭因素。

從經濟的角度而言，有以下三個因素可以解釋上述之轉變。第一、農業生產在小龍村的重要性減低，非農業工作就業機會在 1970 年代末期取

代農業生產，成爲一般居民主要的家庭經濟來源。第二個因素是，鄉村工業發展帶給小龍村村民非農業工作機會。如葛伯納與葛瑞黛所指出(Gallin and Gallin 1982)，在1970年代，除了政府在鄰鄉設立工業區，小龍村及其附近地區工廠也有如雨後春筍般地設立，規模從勞力密集的大型工廠到小型的衛星工廠和家庭工廠。第三個因素是，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良：1960年代末期的農地重劃與1970年代末期農業機械與農藥（如，殺蟲劑、除草劑.....等等）的大量使用。農地重劃之後畸零地減少，使得現代化農業機械得以有效地運用於農業生產，進而釋出部分農業生產勞力。

鄉村工業區的興起造成農業地區產業結構的變化，而各類型家庭因其家庭結構之差異，也產生不同的家庭勞動力的措置(allocation)策略以因應農業地區產業結構的改變。從人口遷徙的角度而言，1979資料指出，相對於大家庭，小家庭運用勞動遷徙作爲家庭人力資源運用方式的機會較少。一般而言，小家庭由一對夫妻與其未婚子女組成；即一個小家庭通常僅有二個勞動人口。雖然在1970年代末期，農業生產雖不再依賴大量勞力，但農地持有者還是必須繼續利用時間從事耕種。小龍村周邊的新興非農業工作就業機會與農業生產的現代化與科技化，使得部分農戶可以在參與非農業生產以增加家庭收入之餘，繼續耕種其所持有的農地。這種現象在小家庭中尤其明顯。例如，1979年居住在小龍村裡的勞動人口中有29人以非農業生產工作爲其主要職業，並自述以「自耕農」爲其第二職業。這29人包括21名男性與8名女性村民，他們的主要職業包括商人、工廠工人、或家庭工廠工人。他們分布於24個家庭中，其中6個家庭有勞動移民。若以家庭型態區分，16人(55.2%)是來自小家庭、7人(24.1%)是來自折衷家庭、與6人(20.7%)是來自大家庭；來自小家庭的人數超越來自折衷與大家庭之人數的總和。總括而言，在1970年代末期，小家庭較其他類型家庭較常採用參與地區內之非農業生產活動以增加家庭收入，較少實踐勞動遷徙。

勞動移民普遍存在於型態較大的家庭中，尤其是大家庭。在1979年

的資料中，小家庭的平均人口數為 5.1，折衷家庭為 7.3，大家庭為 14.3。同時期資料顯示，54.7% (58/106) 的大家庭勞動人口居住在外地，而折衷家庭與小家庭則僅有 18.2% 和 12.7% (見 Li 2001: 107)。當部分家庭成員移到都市尋找工作就業機會時，大部分的移民家庭仍然未完全放棄農業生產。當現代農業機械與化學肥料與農藥大量被使用，進而減低對大量人力的需求，大家庭的農業生產或耕作就留給年長或年老的家庭成員，或是兼職的勞工 (特別指的是，那些居住在小龍村從事非農業生產又照顧農地的家庭成員)。資料顯示，在 13 個大家庭中有 19 個村民參與農業生產，其中 10 位村民以農業生產為第一職業，另外 9 名村民主要從事非農業生產且利用閒暇時間從事農業生產 (見表 3)。在 10 位以農業生產為第一職業者中有 9 位年齡達五十歲或以上。另外，在 9 位以農業生產為第二職業者中，6 位之年齡達五十歲或以上，僅僅 3 位小於五十歲。

表 3 小龍村內勞動移民家庭中從事農業生產之村民的特質：1979⁵

	小家庭		折衷家庭		大家庭		總和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以農業生產為第一職業者								
五十歲以下	1	2	0	3	0	1	1	6
五十歲及以上	4	3	3	0	7	2	14	5
合計	5	5	3	3	7	3	15	11
以農業生產為第二職業者								
五十歲以下	2	1	0	0	0	3	2	4
五十歲及以上	0	0	1	1	4	2	5	3
合計	2	1	1	1	4	5	7	7
總計								
五十歲以下	3	3	0	3	0	4	3	10
五十歲及以上	4	3	4	1	11	4	19	8
合計	7	6	4	4	11	8	22	18

⁵ 在 1970 年代末期，由於農業生產收益太低，農業生產普遍不受到重視或是為大部分勞動人口所放棄，因此在此時期僅有少數村民從事農業生產，並以致於此表中多數欄格出現個位數字。無論如何，此表所呈現之資料應該足以支持研究者的論點。

在小龍村的折衷家庭中，有 8 位村民參與農業生產，其中 6 人以農業生產為第一職業，2 人以農業生產為第二職業（見表 3）。在 6 位以農業生產為第一職業之村民中，3 位為五十歲或以上之男性，另外 3 名為五十歲以下之女性。2 位（包括，一男和一女）以農業生產為第二職業之村民年齡皆達五十歲或以上。

1979 年的資料顯示農業人口老化；這種現象尤以較大的家庭特為明顯。如表 3，在所有參與農業生產的村民中，27 位（包括，19 位男性與 8 位女性）年齡達五十歲或以上，其中有 20 名來自折衷家庭（5 位）和大家庭（15 位）。如此同時反映出，型態較大的家庭比小家庭容易將農業生產的工作留給居住在鄉下的年長家庭成員，而居住在鄉下的小家庭成員多選擇以非農業生產工作為主要家庭收入來源，農業生產為其次要工作。

表 3 的資料除顯示出以年齡為主的家庭人力資源運用現象，同時顯示出性別也決定家庭成員間的人力資源運用方式。男性參與農業生產之人數稍微超越女性人數；22 位男性比 18 位女性。在 22 位參與農業生產的男性中，19 位年齡達五十歲或以上；其餘三位年齡小於五十歲。在 18 位參與農業生產的女性中，8 位年齡達五十歲或以上；其餘 10 位年齡小於五十歲。這些數據除了顯示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以年長的村民為主，另外也顯示年輕的農業生產人口以女性居多。這些發現顯示，（1）女性從事農業生產使得居住在小龍村的男性可以參與非農業生產，或是（2）男性家庭成員在從事非農業生產時將農業生產的工作遺留給女性家庭成員。

如上述，雖然折衷家庭與小家庭間在勞動移民的人口數上並無顯著差異，但在 1965 與 1979 年之間，由於大家庭之數目增加，家庭型態與勞動移民之關係增強。這主要可以歸因為大家庭較容易運用勞動人口移動方式來解決其所面對的經濟壓力，因為大家庭有較多的人口數，並且可能有較多的勞動人口。因此，當小龍村的生產或經濟結構改變時，大家庭有較多有利因素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其多餘的勞力。這些經濟結構的改變包括：（1）

農業生產在經濟上的重要性被非農業生產所取代；(2)新興的非農業工作就業機會在小龍村周邊出現；(3)1960年代末期的農地重劃與農業科技的運用降低農業生產對大量人力的需求⁶。總之，這些因素不僅解釋了為何大型態的家庭有較多的勞動移民，同時說明了為何小家庭有較少的勞動移民人口。

綜合以上所言，在早期的小龍村，大型態的家庭不必然因其家庭成員較多而有較多之勞動移民人數，反而勞動遷徙現象應該被視為是一種家庭面對特定時空或外在環境（特別是經濟環境）的反應。在1960年代，小龍村的家庭型態與勞動遷徙的關係並不顯著。二者之間不顯著的統計關係主要可以歸因為，小龍村內需要大量人力以從事農業生產；由於農業生產是村內的主要經濟活動，無論家庭型態為何，大部分人力必須投入農業生產活動，多數的家庭沒有過剩的人力，因此大部分家庭僅有一或二個勞動移民。相對地，1979的資料則顯示，後期的小龍村因農業科技的引進與鄉村工業的興起，使居住在小龍村內的小家庭村民得以在仰賴非農業生產之餘，並利用閒暇以農地增加家庭收入，小家庭成員得以留在小龍村內同時從事農業與非農業生產。而大家庭則因有較多的勞動人口，所以部分具有勞動力的家庭成員得以遷徙到其他地區工作，而將農耕的工作留給其他家庭成員，特別是年長的家庭成員。

二、農地之可及性（accessibility）與勞動遷徙之關係

在缺乏非農業生產之經濟活動的情況下，農地在農村裡是最有價值的資源與生產工具（means of production）。一個家庭擁有的農地面積不僅影響其家庭成員的工作或勞力輸入的機會，也可能決定農地的生產是否可以滿足家庭成員生存/消費需求。因此，「足夠的」農地不僅可以提供家庭成

⁶ 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對於農村勞動力運用的影響不是小龍村特有的現象，而是整體台灣的現象。Park and Johnston（1995: 201）根據對台灣的觀察指出，一九七〇年代政府負擔50%的成本進行農業機械化，而致釋放出更多的農業生產人力。

員足夠的工作機會，也可滿足家庭成員的生存／消費需求；「不足夠的」農地則無法提供家庭成員足夠的工作機會或滿足家庭成員的生存／消費需求。為因應農地不足，部分家庭成員可能必須「出售」勞力以取得工作機會與賺取薪資，以維持家庭生計。勞動遷徙是一種解決這二個潛在困境的方法之一（Grigg 1980; Guest 1989; Wood 1981）。

在 1960 年代，農業生產是小龍村的主要經濟基礎。由於農地是主要的生產工具，農地的「相對面積」對村民的生活影響極大。當農地面積無法提供村民足夠的工作機會或生存／消費需求，村民便可能採取策略來解決他們的生計困境。因為勞動遷徙是解決生計困境的方式之一，當農地無法提供村民足夠的「工作機會」或「生存／消費需求」，村民便可能利用勞動遷徙的方式（部分家庭成員移往都市去尋找工作就業機會）來解決他們的生計困境。據此，筆者提出二個研究假設：

H2：家庭勞動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越小，家庭勞動移民的人數越多。

H3：家庭所有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越小，家庭勞動移民的人數越多。

（一）測量方法

第二個研究假設（H2）主要在檢視農地所能提供的工作或勞力運用的機會與勞動遷徙之關係，第三個研究假設（H3）則主要在檢驗農地所能滿足的生存／消費需求與勞動遷徙之關係。在檢驗這二個研究假設前有必要先將農地的面積做詳盡的定義。

家庭的總農地面積包括自有的與佃租的農地面積。在本文中，農地之可及性以「家庭勞動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與「家庭所有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二方式測量。「家庭勞動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之計算方式為，前述的家庭總農地面積除以家庭勞動人口數。換言之，計算公式中的分子為「家庭可耕種農地之總面積」，而分母是「家庭中所有勞動人口數」。這裡

所指的「勞動人口數」，不僅包括正居住在小龍村的非遷徙家庭勞動人口，也包括遷徙的勞動人口。值得注意的是，這變數並無法測量一個家庭中的勞動人口是否有足夠的工作機會，但是，從這變數我們可假設，有較大的「家庭勞動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的家庭可提供其家庭成員較多的農業工作機會。

類似地，「家庭所有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之計算方式為，前述的家庭總農地面積除以家庭總人口數。換言之，計算公式中的分子為「家庭可耕種農地之總面積」，而分母是「家庭中的所有人口數」。因此，分母包括具有與不具有勞動力的家庭成員，也包括遷徙人口與非遷徙人口。從此變數之計算方式，我們假設每一個家庭成員有相近的生存/消費需求。當「家庭所有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之數值越大，該家庭的農業生產越大，也較容易滿足其家庭成員的生存/消費需求。但是，「家庭所有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並無法顯示是否一個家庭有足夠的農業生產可以提供家庭成員的生存/消費需求。

廣義地來說，在早期的農業聚落，勞動遷徙與農地需求是息息相關的。一方面，假如農地太少以至於無法滿足其家庭成員的工作與生存/消費需求，高農地需求可能造成高勞動遷徙。另一方面，因為勞動遷徙可減少需要農業工作機會的家庭人口數，勞動遷徙可降低對農地需求的壓力。由於，本研究的焦點在於檢驗農地之可及性對勞動遷徙策略運用之影響，「農地之可及性」被視為決定「勞動遷徙」的重要因子。因此，本研究假設為，「提供勞動人口勞力輸入或是提供家庭勞動人口工作就業機會之農地面積」與「用以滿足家庭成員消費/生存需求之農地面積」影響家庭勞動遷徙。

（二）分析

研究者利用皮爾森相關係數檢驗「農地可及性」與「勞動遷徙」間之關聯性的方向與強度；如表 4 所示，在 1965 年勞動遷徙與家庭勞動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有顯著的統計相關，但與家庭所有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之

間的相關並不顯著。根據統計數值，每增加一個標準差的「家庭勞動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勞動移民的人口數則減少 0.22 個標準差。每增加一個標準差的「家庭所有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勞動移民的人口數則減少 0.15 個標準差。如此，農地的面積與勞動遷徙是負相關，一個家庭的「農地可及性」越高，其家庭之勞動移民人數可能越少。

1979 的資料也顯示與 1965 年之資料相似的特性，每增加一個標準差的「家庭勞動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勞動移民人口數則減少 0.19 個標準差，每增加一個標準差的「家庭所有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勞動移民人口數則減少 0.13 個標準差。無論如何，根據 1979 年的資料，農地可及性與勞動遷徙間的統計關聯性是不顯著的。

表 4 農地可及性與勞動遷徙之關聯性：1965 和 1979

	勞動遷徙			
	1965		1979	
	相關係數	樣本數	相關係數	樣本數
家庭勞動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	-0.22**	81	-0.19	72
家庭所有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	-0.15	81	-0.13	72

*** p<0.01 ; ** p<0.05 ; * p<0.10

如表 4 之統計結果顯示，以 1965 年之資料檢驗第二與第三研究假設，僅家庭勞動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與勞動移民的人口數有顯著統計相關性。這個顯著的統計負相關支持第二個研究假設-家庭勞動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越小，家庭勞動移民的人數越多。在 1960 年代，家庭勞動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會影響一個家庭是否會採用勞動遷徙策略，如果一個家庭其家庭勞動人口的平均農地面積大，則該家庭採取勞動遷徙方式以解決家庭經濟壓力之可能性則小。

部分學者認為人口移動是一種家庭生計策略(見 Grigg 1980 ; Guest 1989 ; Wood 1981)，即農村居民利用人口遷徙方法來滿足家庭成員對工作機會的

需求與／或家庭的生存／消費需求，因此農地的可及性與勞動移民存在著一種負相關。然而，農地的可及性與勞動移民的統計相關在 1970 年代末期並不顯著。值得討論的是，農地的可及性與勞動移民之相關性雖然低或不顯著，但並不是暗示農地可及性對家庭勞動遷徙完全沒有影響。農地可及性與勞動遷徙人口數間的不顯著統計相關，主要是肇因於家庭彼此間「農地可及性」的差異小。農地可及性是以「所有家庭成員或家庭勞動人口的平均面積」代表，但是此測量方式並無法指出是否一個家庭有足夠或不足夠的農地。農地可及性與勞動遷徙之不顯著相關是由於農村內各家庭在平均農地面積差異性小所導致；家庭彼此間農地面積之差異無法解釋家庭勞動移民人數之變異。因此，雖然家庭勞動移民人數的多寡與農地可及性無顯著相關，但家庭勞動移民仍舊是由於農地面積的普遍不足。透過與台灣全島之農地資料比較可以應證小龍村農地不足的現象。以 1965 年為例，全台灣農業家庭的平均農地面積為 0.95 甲，而小龍村內之家庭平均僅耕種面積為 0.53 甲。

另一方面，不顯著的統計相關係數也可能暗示著，農地的價值對農村居民而言已逐漸下滑。第一、如 Ho (1978) 所言，在 1960 年代末期，從事非農業生產者的平均收入是農業生產者所得的三倍。第二、尤其在 1970 年代，鄉村工業的興起造成非農業生產的工作機會增加，而使得農業生產無論是在提供「工作機會」或滿足「生存／消費」需求都可能不再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因此，不僅「勞動遷徙」與「農地可及性」間的相關係數未達顯著水準，而且相關強度也下降。

三、家庭成員在地區勞動市場參與與勞動遷徙之關係

主張結構性因素影響個人遷徙決策的學者認為，人口遷徙的決策不可能決定於真空的狀態下；大環境中的因素對個人的人口遷徙決策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Goldscheider 1987; Massey 1990a)。在前面的段落中，筆者已討論勞動移民與農地可及性的關係，在本單元中，我們將進一步討論勞動移民與一個結構性因素--地區之勞動市場--的關係。農業家庭為解決人口

過剩的問題與農業生產不足的窘境，其部分家庭成員可採取二種措施來因應所面對的問題。這二種可能措施是：(1) 人口移動；(2) 參與地區內非農業生產之勞力市場。當其中一者被選擇，則另一種即可能被放棄。因此，「參與地區內非農業生產之勞力市場」與「勞動遷徙」有緊密的相關性。

在農業地區，由於農地不足，使得家庭成員的工作機會需求或生存／消費需求無法得到滿足，部分家庭成員因此必須出賣勞力賺取工資以維生計。人口移動雖是一種可以增加家庭收入與提高家庭成員工作機會的人力資源運用方式，但是它卻不是一種必然的手段，當地區內的非農業工作機會存在時，勞動遷徙不一定會被採用。從這個角度而言，勞動遷徙與地區內的工作就業機會存在一種負向相關，當地區內非農業工作機會少時，勞動遷徙的可能性加大；反之，當地區內非農業工作機會增加時，勞動移民的可能性將減小。從另一角度而言，「地區內勞動市場參與率」的高低可能是受到「勞動遷徙」的影響；當部分家庭勞動成員移往他地尋找工作就業機會時，投入農村地區的勞力市場的家庭成員人數自然會減少。綜合上述，本研究的第四個研究假設為：

H4：家庭成員在地區內勞動市場參與率的高低與家庭勞動移民人口數成負相關。

(一) 測量方法

第四個研究假設主張，一個家庭中之成員在地區內的勞動參與率與勞動移民之人口數是負相關。詳細的可能情況有二：(1) 一個家庭如果有較低的地區內勞動市場參與率，其將有較多的勞動移民人口數；(2) 勞動移民人數較多的家庭，有較低的地區內勞動市場參與率。

在本研究中，家庭的「地區內勞動市場參與」以二種方式測量：(1) 家庭的地區勞動市場參與率；(2) 家庭成員之薪資勞動市場參與比例。前者是，家庭中所有在小龍村內持有工作的成員人數除以所有具有勞動力的

家庭成員總數，再乘以 100。這個計算過程中所使用的分子包括所有居住在小龍村內並持有工作之家庭成員（包括所有參與農業生產與非農業生產者、家庭管理⁷.....等等）。分母則包括所有具有勞動力之家庭成員，他們可以是家庭內之非移民者或是居住外地的移民者。後者之計算方式為，家庭內在小龍村參與薪資勞動市場之成員人數除以所有家庭成員之人數，再乘以 100。於此，在小龍村內參與薪資勞動市場之人員不包括自耕農或從事「家庭管理」之人員。上述的二種測量方法，不僅顯示出家庭成員在小龍村內取得工作就業機會之可能性，也顯示家庭中之勞動人口在小龍村內出售勞力以賺取工資、增加家庭之生存/消費能力之可能性。

（二）分析

一般而言，由於家庭內的勞動人口數是固定的，當參與農村地區勞動市場的家庭成員多時，其「地區內勞動市場參與」會較高，同時也會使得家庭勞動移民人口數變低；相反地，當家庭勞動移民人口數增加時，因為留在農村內的勞動人口數降低，其家庭的「地區內勞動市場參與率」將會下降，前述二者之關係因此應為負向的。但是值得思考的是，這二者的關係是否會隨著時間的變化或結構環境的變化仍維持相同的水準。在本單元中，研究者不僅將描述二者之相關性，更將討論是否相關強度會隨時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並探討其變化的原因。

如表 5 所示，家庭之勞動遷徙與「家庭的地區勞動市場參與率」在 $\alpha=0.01$ 的水準下有顯著的負相關。以 1965 年之資料為例，「家庭的地區勞動市場參與率」與「勞動移民」間的相關係數為 -0.70，並且達顯著水準。但

⁷ 如主計處所定義，「非勞動力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 15 歲，不屬於勞動力之民間人口，包括就學、料理家務、高齡、殘障，想工作但未找工作及其他原因等而未工作亦未找工作者（見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1203&ctNode=1735>）」，從事「家庭管理」者應為非勞動力。然如此之定義頗受社會學者的批評，Waring（1988）則主張從事「家庭管理」的家庭成員雖無法實際提供家庭的經濟收入，但其角色對家庭經濟有間接之貢獻。故本研究接受其觀點將從事「家庭管理」的家庭成員視為「勞動力」。

是，家庭之勞動移民與「家庭成員之薪資勞動市場參與比例」之相關性非常低，並且未達顯著水準。在 1979 年，家庭之勞動移民與地區之勞動市場參與率有顯著之負相關，二者間之相關係數為-0.83。「勞動遷徙」與「家庭成員之薪資勞動市場參與比例」間之相關強度為-0.35。總之，針對 1965 年之資料，當勞動市場參與是以「家庭的地區勞動市場參與率」為代表，第四個研究假設是被支持的；如果勞動市場參與是以「家庭成員之薪資勞動市場參與比例」為代表，第四個研究假設則是不被支持的。針對 1979 年之資料，無論「地區內勞動市場參與」是如何被測量，第四個研究假設都是被支持的。

表 5 小龍村內勞動市場參與和勞動遷徙之相關性：1965 和 1979

	勞動遷徙			
	1965		1979	
	相關係數	樣本數	相關係數	樣本數
家庭的地區勞動市場參與率	-0.70 ^{***}	82	-0.83 ^{***}	73
家庭成員之薪資勞動市場參與比例	-0.05	82	-0.35 ^{***}	73

*** p<0.01；** p<0.05；* p<0.10

大體上，勞動遷徙與在地區內取得工作機會呈現負相關；一個具有較高的地區內勞動參與率的家庭，其勞動移民之人數則較低。然而，根據表 5，我們必須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在 1965 年勞動移民與「家庭成員之薪資勞動市場參與比例」無顯著之統計相關，並且相關強度會是如此的弱？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地區之經濟結構著手討論。在 1960 年代，小龍村以農業為其主要之經濟基礎，大部分的村民務農，非農業之工作機會相當少。如表 6 所示，在 1965 年居住在小龍村內有 252 位勞動人口，其中有 134 位村民自述為自耕農，佔所有居住在小龍村內之勞動人口的 53.2%。在居住在小龍村內之女性勞動人口中，73 人自認其主要之職業為「家庭管理」，佔所有女性勞動人口之 50%。在這 73 位從事「家庭管理」的女性中，有 6 位自認農業生產為其次要職業，和 3 位自認非農業生產為其次要職業。整個小龍村僅有 33 位村民出售勞力以賺取薪資、自設商店或工廠、在自

家工廠中工作。如此顯示，在 1960 年代，小龍村裡居民參與薪資勞動市場以維持家庭生計或增加家庭收入之可能性與機會很少。稀少的機會相對地造成少數可以在小龍村內取得賺取薪資的工作機會。

理論上，勞動遷徙應該與地區內之工作機會存在一種負相關。然而，1960 年代之資料所顯示之不顯著相關不應單純被視為「地區內之有給職的工作機會」與地區內之勞動人口外移現象毫無關係。這種弱且不顯著的統計相關應該歸因於地區內以農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地區內之薪資工作機會相當有限。在 1960 年代，因為農業生產需要大量的人力，小龍村裡大部分的勞動人口都留在農村裡耕種農地。同時期，整個地區僅有 49 位男性與 16 位女性為季節性勞動移民。這些勞動移民，特別是男性，常常隨著地區內農業生產的週期，在農村與移居的目的地間來回地移動。⁸

1970 年代的鄉村工業化，使得中小型和家庭工廠紛紛興起 (Ho 1979; Park and Johnston 1995)。此現象提供小龍村居民更多非農業生產的工作機會。⁹從 1965 年到 1979 年，小龍村居民參與地區內非農業勞動市場的人數從 32 人增加到 92 人。這些人在所有勞動人口中，也從 12.7% 增加到 45.0%。在 92 位參與非農業生產的居民中，24 人開設自己的事業，其他 68 人是出賣勞力賺取薪資 (見表 6)。在 1970 年代末期，小龍村的農業生產不再像 1960 年代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農業生產所產生的利潤也不如非農業生產的所得 (B. Gallin and R. S. Gallin 1982)。經濟結構的變革使得地區內的村民不再自述是自耕農；自耕農的人數也從 1965 年的 134 人急遽地下降至 1979 年的 60 人 (見表 6)。

在 1970 年代後期，農業生產技術的改良釋出部分勞力；例如，在田

⁸ 如葛伯納與葛瑞黛 (1974: 344) 所言，「在最初，男人自己到都市找工作，把妻兒留在鄉下，然後把部分的工作所得寄回鄉下老家。在必要時，他們回到老家幫忙播種、收割稻米，和參與廟會或其他宗教儀式。」

⁹ 這個現象不僅出現於小龍村地區，同時出現於台灣多個農業縣 (見蔡宏進，1981)。

表 6 小龍村內之勞動力與職業類型：1965 和 1979

	男性		女性		總數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1965						
自耕農	79	74.5	55	37.7	134	53.2
家庭管理	0	0.0	73	50.0	73	29.0
自僱（非農業）	7	6.6	1	0.7	8	3.2
家庭工人	0	0.0	1	0.7	1	0.4
薪水工人*	9	8.5	15	10.3	24	9.5
職業軍人或服役	8	7.5	-	-	8	3.2
失業的	3	2.8	1	0.7	4	1.6
合計	106	100.0	146	100.0	252	100.0
1979						
自耕農	35	32.1	25	22.9	60	27.5
家庭管理	1	0.9	39	35.8	40	18.3
自僱（非農業）	20	18.3	4	3.7	24	11.0
家庭工人	1	0.9	6	5.5	7	3.2
薪水工人*	33	30.3	35	32.1	68	31.2
職業軍人或服役	17	15.6	-	-	17	7.8
失業的	2	1.8	0	0.0	2	0.9
合計	109	100.0	109	100.0	218	100.0

* 薪水工人包括所有出賣勞力賺取薪資之勞動工人。這些認可以是從事農業生產或非農業生產。

裡鑿井和利用柴油引擎或電力馬達抽水灌溉農田，以除草劑與殺蟲劑除草除蟲.....等等的新農業生產方式降低對大量勞力的需求，使得部分勞力可以參與非農業生產。無論如何，農業生產無法完全由機械取代，完全放棄農業生產也不切實際，農業生產因此仍然繼續。1970 年代新興的非農業生產工作機會使得居住在小龍村內的居民一方面可以參與非農業生產以增加家庭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就近照顧與耕種農田。

另一現象是，大部分的農業生產工作遺留給村中年長或退休的村民，而年輕人則參與非農業勞力市場。因此，大量勞動人口參與小龍村周邊的勞力市場，不僅反映絕大多數個別家庭有家庭成員投入小龍村周邊的勞力

市場，也代表家庭成員參與地區內之勞力市場以增加家庭收入的比例增高。這樣的增加趨勢使得勞動移民人口數與家庭的薪資勞動市場參與率間的統計相關，在 1970 年代末期變得顯著且提高。

總之，針對 1965 年與 1979 年之資料，勞動遷徙與「家庭成員之薪資勞動市場參與比例」間的統計相關並不一致。但是，在二個時期，勞動遷徙與「家庭的地區勞動市場參與率」間皆有很強且顯著的統計相關。「勞動遷徙」與家庭的「地區勞動參與」間的相關強度的提高可歸因於鄉村經濟結構的改變（特別是，非農業生產工作機會的增加）。小龍村及其周邊的工業發展改變村內居民的人力資源運用的現象；在 1960 年代，僅有部分家庭（不分其家庭型態）有遷徙到他地的勞動人口，到了 1970 年代末期，鄉村工業為地區內的居民帶來工作就業機會。在二個時期間，「勞動遷徙」與「地區內勞動參與」間相關性的增強反映出，新增加的薪資工作機會不僅提供居民工作機會，也提高家庭的收入的可能性。同時，如前所述，遷徙到都市以尋找工作就業機會僅是多種家庭用以解決經濟壓力的方法之一，當地區內的薪資工作機會提高時，以勞動移民方式解決「工作機會需求」或「生存/消費需求」的必要性勢必降低。

伍、結 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台灣，在經濟結構方面快速地變遷。台灣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定位，也因其與其他國家越發密切的經濟貿易關係而越明顯，快速的經濟發展使得台灣在短時間內由一個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邊陲國家轉變成一個半邊陲國家。國家經濟政策的變革改變了國家的經濟結構，當然也改變了鄉村地區的經濟結構，也因此使得小龍村村民必須重新調整人力資源運用策略。勞動移民是這個人力資源運用策略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本文主要探討小龍村地區之經濟結構的改變與勞動遷徙現象的轉變間的關係。

鄉村工業未興起前，小龍村的家庭型態與家庭勞動移民人口數間的統計關係並不顯著。二者之間的不顯著關係主要可以歸因為，小龍村內大量的人力資源被用以從事農業生產。人力資源不足，勞動遷徙現象因而不普遍。相對地，鄉村工業興起後，大家庭比折衷家庭和小家庭有較多的勞動移民人口數，同時也使居住在小龍村內的村民得以在仰賴非農業生產之餘，並利用閒暇以農地增加家庭收入。由於農業科技的引進，農業生產釋出部分的人力，使得大家庭比其他類型家庭有更多的勞動移民。

再者，農地可及性與勞動遷徙之相關性低或不顯著。但是這種現象並不應將其視為農地可及性對家庭勞動遷徙完全沒有影響，而應歸因於一九六〇年代的小龍村中家庭間的農地面積差異性太小而致無法解釋家庭移民人數之差異。然而，雖然家庭移民人數的多寡與農地可及性無顯著相關，家庭的勞動遷徙仍舊是導因於農地面積之不足；農地統計資料顯示，小龍村之農地面積較全台灣農戶的平均面積為低。但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不顯著的相關係數可能反映農地的價值在村人的心目中正有下降的趨勢。

最後，本研究探討地區勞動市場的參與與勞動遷徙現象的關係。針對 1965 年與 1979 年之資料，勞動移民與「家庭的地區勞動市場參與率」間皆有很強且顯著的統計相關。小龍村周邊的工業發展改變小龍村內居民的人力資源配置方式，使得村內居民透過參與地區內的勞動市場而降低其家庭成員移到外地尋找工作機會的人數。在 1960 年代，僅部分家庭有足夠的人力資源，而致可以有勞動移民，到了 1970 年代末期，鄉村工業為地區內的居民帶來工作就業機會，同時也增加居民賺取農業生產以外的薪資的機會。如前所述，遷徙到都市以尋找工作就業機會，僅是多種家庭用以解決經濟壓力的人力資源配置策略之一。當小龍村附近增加新的薪資工作機會，人力資源的配置策略則傾向將家庭勞動力留在農村內，也即「離農不離村」。因此，1979 年的資料顯示，一個家庭的勞動移民人數同時與「家庭成員之薪資勞動市場參與比例」和「家庭的地區勞動市場參與率」有顯著的負向統計相關。

謝 誌

本文作者特別感謝葛伯納博士(Dr. Bernard Gallin)與葛瑞黛博士(Dr. Rita S. Gallin)分享他們蒐集但未曾進行統計性與系統性分析的原始資料。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尹建中(1978)同質性(單元化)與異質性(多元化)遷移模式:一項人類學對於人口遷移研究的分類, *人口學刊*, 2: 1-26。

李棟明(1974)臺灣人口性狀別遷移率差異之研究之研究, *臺灣文獻*, 25(2): 17-26。

姜蘭虹(1978)台灣人口遷移特性及傾向之性別差異, *人口學刊*, 2: 60-81。

張明正(1979)臺灣地區人口移動之選擇性, *人口學刊*, 3: 43-68。

廖正宏(1977)台灣農村勞力移動之研究, *台灣銀行季刊*, 28(4): 151-191。

劉克智(1993)Demographic Issues and Trends as Reported in the 1990 Census of Taiwan, *自由中國之工業*, 80(2): 41-51。

劉克智、蔡勳雄(1990)Urban Growth and Employment Restructuring in Taiwan, *自由中國之工業*, 74(2): 17-33。

蔡宏進(1978)台灣的發展政策及島內人口移動, *人口學刊*, 2: 27-59。

蔡宏進(1981)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Taiwan: Its Structure and Impact on the Rural Economy, *自由中國之工業*, 56(6): 17-32。

蔡勳雄(1990)Population Decentralization Policies: The Experience of Taiwan, *自由中國之工業*, 73(3): 1-12。

英文部分

Boyd, M. 1989. "Family and Personal Network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New Agend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3(3): 638-670.

- Chant, S. 1992. "A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Gender-Selective Migration." pp. 197-206 in *Gender and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dited by S. Chant. New York, NY: Belhaven Press.
- Dinerman, Ina R. 1978. "Patterns of Adaptation Among Households of U.S.-Bound Migrants from Michoacan, Mexic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2(4): 485-501.
- Gallin, Bernard. 1966. *Hsin Hsing, Taiwan: A Chinese Village in Chan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allin, Bernard, and Rita S. Gallin. 1974. "The Integration of Village Migrants in Taipei." pp. 331-358 in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edited by Mark Elvin and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llin, Bernard, and Rita S. Gallin. 1982. "Socioeconomic Life in Rural Taiwan: Twenty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 *Modern China* 8(2): 205-246.
- Goldscheider, Clavin. 1987. "Migr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Analytic Issues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Developing Nations." *Sociological Forum* 2(4): 674-696.
- Grigg, David. 1980. *Population Growth and Agrarian Chang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uest, Philip. 1989. *Labor Alloc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Ho, Samuel P.S. 1978.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o, Samuel P.S. 1979. "Decentraliz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Taiw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8(1): 77-103.
- Li, Chun-Hao. 1999. "Rural-to-Urban Migration and Subsequent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34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ology, Tel-Aviv, Israel.
- Li, Chun-Hao. 2001. *Family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Taiwan*.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East Lansing, Michigan.

- Lin, Kuan-Pin. 1985. *The Structure of Personal Consumption in Taiwan: 1951-1980*. Economic Monograph Series No. 6. Taipei: Chung-Hua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 Lu, Min-Jen. 1981.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81. Taipei, Taiwan.
- MacDonald, John S., and Leatrice D. MacDonald. 1974. "Chain Migration, Ethnic Neighborhood Form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pp. 226-235 in *An Urban World*, edited by Charles Tilly. Boston, MA: Little Brown.
- Massey, Douglas S. 1988.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4(3): 383-413.
- Massey, Douglas S. 1990a. "Social Structure, Household Strategies, and the Cumulative Causation of Migration." *Population Index* 56(1): 3-26.
- Massey, Douglas S. 1990b.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Immigr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10: 60-72.
- Massey, Douglas S., and Felipe Garcia-Espana. 1987. "The Social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cience* 237: 733-738.
- Massey, Douglas S.,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1993.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3): 431-466.
- Massey, Douglas S., Rafael Alarcon, Jorge Durand, and Humberto Gonzalez. 1987. *Return to Aztlan: The Social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rom Western Mexico*.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ines, Richard. 1984. "Network Migration and Mexican Rur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pp. 136-155 in *Patterns of Undocumented Migratio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Richard C. Jones. Totowa, NJ: Rowman and Allanheld, Publishers.

- Mines, Richard, and Alain de Janvry. 1982.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an Rur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4(3): 444-454.
- Mullan, Brendan P. 1986.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s on the Occupational Status of Migrant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7(1): 69-86.
- Park, Albert, and Bruce Johnston. 1995. "Rural Development and Dynamic Externalities in Taiwan'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4(1): 181-208.
- Schmink, M. 1984. "Household Economic Strategies: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9(3): 87-101.
- Speare, Alden, Jr. 1974. "Urbanization and Migration in Taiw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2(2): 302-19.
- Stark, Oded. 1983. "A Note on Modeling Labour Migration in LDC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4): 539-543.
- Stark, Oded. 1984. "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LDCs: A Relative Deprivation Approac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2(3): 475-486.
- Stark, Oded. 1991. "Migration in LDCs: Risk, Remittances, and the Family."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28(4): 39-41.
- Stark, Oded, and David E. Bloom. 1985.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2): 173-178.
- Stark, Oded, and J. Edward Taylor. 1989.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mography* 26(1): 1-14.
- Taylor, J. Edward. 1986. "Differential Migration, Networks, Information and Risk." pp. 147-171 in *Research in 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Migration, 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vol. 4), edited by Oded Stark. Conn.: JAI Press Inc.
- Tilly, Charles, and C. H. Brown. 1967. "On Uprooting, Kinship, and the Auspices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8(1): 139-164.
- Waring, Marilyn. 1988. *If Women Counted: A New Feminist Economics*. San

Francisco, CA: Harper Collins.

Wood, Charles H. 1981. "Structural Changes and Household Strategie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Rural Migration." *Human Organization* 40(4): 338-344.